

王其俊◎著

孟子解读

国学经典
解读丛书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泰山出版社

国学经典
解读丛书

孟子 解读

（明）王阳明著

王其俊◎著

王阳明著

王其俊著

王阳明著

王其俊著

王阳明著

王其俊著

王阳明著

王其俊著

王阳明著

王其俊著

王阳明著

王阳明著

王其俊著

王阳明著

泰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解读/王其俊著. —济南:泰山出版社, 2003. 12
ISBN 7-80634-402-0

I. 孟... II. 王... III. ①儒家②孟子—研究
IV. B2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012 号

孟子解读

著者/王其俊

出版/泰山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165×240mm 16K

印张/24.75

字数/440 千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34-402-0

定价/38.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泰山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地址:济南市马鞍山路 58 号 8 号楼 邮编:250002 电话:2025510

导 言

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儒家大师,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孟子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的先秦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既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又对东、西方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对《孟子》一书作较全面、系统的解读,是研究孟子思想及先秦儒学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这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有着积极的意义。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终年84岁。

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受到母亲的良好教育。赵岐《孟子题辞》、韩婴《韩诗外传》、刘向《列女传》等书,记载了“孟母三迁”、“断机教子”、“杀豚不欺子”等故事和传说,大体反映了孟子少年时代的家庭状况。故事的大意是说,孟子幼年时家的附近有一块坟地,经常有人前来埋葬、祭奠死者。在这种环境影响下,孟子常模仿成人做丧葬的游戏。孟母担心这种环境对孟子幼小的心灵产生不利的影响,便将家迁往集市附近。集市上终日人来人往,商人高声叫卖。孟子耳濡目染,又模仿商人喊叫喧闹,孟母便将家迁往学宫附近,从此定居下来。学宫中聚集很多懂礼仪、有学问的读书人。孟子在这种良好环境的熏陶下,学习礼仪,孟母非常高兴。孟子幼年读



书时,开始常贪玩而不用功。有一次,孟母正在织布,恰好孟子蹦蹦跳跳地从学堂回来。孟母询问孟子近来学习怎么样,孟子回答说跟以前一样,不好也不坏。孟母听了这话,又生气又伤心,操起剪刀把布机上刚织好的布从中剪断,并乘机教育孟子说:“你不用心学习,荒废学业,就像我剪断机上的布一样。你用功学习,增长知识,才能学到本领。”从此以后,孟子牢记母亲的话,早起晚睡,刻苦学习。尽管上述故事是传说,但它大体反映了孟子幼年家贫和受到母亲良好教育的一般状况。

孔子所在的鲁国崇尚信义,重视礼教。孟子所居的邹国与鲁国相连。孟子幼年就受到鲁国礼教、风俗和孔子事迹的熏陶。约15岁时,孟子怀着对孔子的仰慕之情,前往鲁国求学,私淑子思的学生。他经过刻苦学习,后来逐渐成为一名博学多才的学者和儒家大师,为其后来游说诸国打下了基础。

孟子40岁左右时,主要在邹、鲁一带从事讲学,广招学生,宣传孔子的仁德学说,影响日渐扩大。邹穆公听到孟子的贤名,便任他为士。不久,邹国与鲁国发生武装冲突,邹国的官吏战死33人,百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长官被杀也不去救援。邹穆公十分恼火,便抱怨百姓。孟子批评邹穆公不实行仁政,结果遭到了百姓的报复。孟子在邹为士时,父亲去世,便实行三鼎之礼,守丧三年。邹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在当时的形势下难以完成以仁政统一天下的宏图大业。孟子为了实现济世救民、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便于公元前329年,率领学生首次出游北方实力强盛的齐国。

齐国是一个依山傍海、膏壤千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实力强盛的诸侯大国。齐威王为了实现称霸诸侯、统一天下的愿望,在稷下学宫招集了大批贤士。孟子至齐后,被命为充当顾问的稷下大夫,曾与匡章交游,劝说齐王打开棠地粮仓救济百姓。公元前326年,孟母去世。孟子怀着悲痛的心情护送母亲的灵柩回鲁国安葬,实行五鼎之礼,守丧三年。公元前323年,孟子返回齐国。

孟子在齐国积极向齐王宣传仁政主张,希望通过齐王实现自己的理想。齐威王一心想振兴齐桓公的霸业,始终没有采纳孟子以德服人、获得民心的政治主张。公元前323年,孟子拒绝接受齐王所赠上等金100镒,率领学生离开齐国。



孟子听说宋国将实行仁政,便风尘仆仆前往宋国。当时,宋君为幼主,左右的贤臣不多。孟子曾以幼子学语为譬,告诫宋臣戴不胜应多向宋君推举贤才,仅凭少数人的力量推行仁政是不行的。有一次,宋大夫戴盈之对孟子说:遵照您的意见,我们想实行十分抽一的税法,免除关卡、市场上的捐税,但今年不能实行,暂时减轻一些,明年再完全实行。孟子以“攘邻之鸡”为譬,批评了戴盈之的错误。

孟子在宋国时,滕文公曾作为太子出使楚国,往返经过宋国,两次会见了孟子。孟子向他讲了许多关于仁政的道理。由于宋国君主对实行仁政缺乏果断措施,孟子于公元前322年接受赠金70镒,离开宋国,途中经过薛,返回邹国。

这一年,鲁平公即位,想让孟子的学生乐正子主持国政。大概经过乐正子的引荐,鲁平公想会见孟子。由于嬖人臧仓的阻挠,孟子在鲁未遇,于是返回邹国。

公元前322年,滕定公死。滕太子两次派然友前往邹国向孟子请教丧葬之礼。孟子主张实行三年之丧。后来,受滕文公的聘请,孟子前往滕国。孟子在滕期间,多次与滕文公问答,较系统地阐述了重视农事、赋税有制、加强教化等仁政主张,向毕战阐述了井田制,批驳了许行否认社会分工的主张,全面地阐述了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论和产品交换论。孟子的仁政主张虽被滕文公所采用,但滕是个处于齐、楚强国中间的弱小国家,面临着被大国并吞的危险。孟子对滕国是事齐还是事楚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感到无能为力。为了实现以仁政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公元前320年,孟子不远千里,前往招纳贤士的魏国。

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多次交谈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诱问,或譬喻,既严厉巧妙地批评了梁惠王不行仁政、祸害百姓的错误,又阐述了君仁臣义、君民同乐、不违农时、发展生产、省刑薄敛、加强教化的仁政主张。孟子在魏国时,曾批驳景春赞扬公孙衍、张仪是大丈夫的言论,与淳于髡辩论灵活权变,与白圭论治水和二十抽一的税法,等等。孟子在魏虽受到惠王的礼遇,但其仁政主张始终未被采用,曾气愤地抨击梁惠王是不仁之君。公元前319年,梁惠王去世。第二年,梁襄王继位。孟子认为梁襄王是一个无所作为之君,便于这一年离开魏国,前往齐国。





孟子至齐时,正值齐宣王初年,他对齐王实行仁政充满了信心。《孟子》书中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交谈最多。他在与齐王的交往中,侃侃而谈,有时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有时引用《诗》、《书》等古籍,有时引用圣贤言论和事迹,有时设类比和譬喻,有时运用诘难和归谬,有时循循善诱阐述仁政,有时义正辞严批驳谬误,较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君仁臣义、各尽其道、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诛杀暴君、民贵君轻、以民为本、以民为宝、制民之产、发展生产、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兴办学校、加强教化、获得民心、统一天下等仁政理论。这既是孟子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又是其思想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孟子的仁政主张曾使齐宣王受到一定鼓舞和赞赏,但齐王毕竟是急功近利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当权者。他骄奢淫逸,喜好财货、美色而不恤民苦,极力想用武力并吞别国和称霸诸侯,从而与主张仁政、王道的孟子日益产生了分歧。公元前314年的齐伐燕事件,加剧了孟子与齐宣王的分歧与冲突。齐伐燕失败后,齐王感到很对不起孟子,便亲自前来看望他。后来又通过时子挽留孟子,准备给孟子在都城中建一所房子和给予万钟的俸禄,让他留在齐国讲学。孟子认为,游齐的目的是志在行道和济世救民,而不是贪图富贵利禄,便拒绝齐王的挽留,于公元前312年离齐归邹。

孟子结束了近20年的游说生涯,晚年在邹聚徒讲学和著述,与公孙丑、万章等高足弟子,撰述《孟子》七篇,终老于邹。

《孟子》一书的作者,主要是孟子本人,其中也有万章、公孙丑等学生的记述。

《孟子》原文七篇并无上下卷之分,亦无章次之别。东汉赵岐为《孟子》作注时,将各篇划分为上下卷,每卷分若干章。七篇的顺序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全书总计260章,约34000字。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书》是明代姚士粦伪撰。对《孟子》的注释著作甚多,较优的有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焦循《孟子正义》,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二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著名历史人物的产生,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孟子思想的产生,与战国中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社会状况是紧密相联的。

战国中期,各大诸侯国经过变法和改革,基本确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封建大一统的任务逐步提上日程。各大国统治者为扩大疆域,称霸诸侯,彼此兼并,掠夺土地、人口和财富,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统一政权的产生。但连年的战争和统治者的压迫剥削,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一大批有远见的思想家,为实现封建统一和结束兼并而奔走呼号。孟子怀着对百姓苦难的深深同情和济世救民、以仁政统一天下的政治抱负,游说诸侯,宣传仁政,抨击时弊,揭露暴政,提出结束兼并、实现统一的主张,追求政治清明、天下统一、君仁臣义、君民同乐、民风淳朴、道德高尚的美好理想社会。这样,战国中期的社会政治状况就是孟子思想产生的政治根源。

战国时代,广大劳动者从奴隶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劳动兴趣和生产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发展,并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封建国家和地主占据了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因而他们在生产中居于支配地位和占有农民的部分劳动成果。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艰苦劳动促进了封建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孟子主张制民之产,实行分工交换,种谷植桑,饲养家畜,减轻赋税,就是以一家一户个体小生产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因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孟子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

随着各国封建经济、政治的基本确立,必然有一套与其相适应的封建意识形态。在诸侯割据、群雄并峙的形势下,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尚不平衡,封建国家统一的社会意识还未形成。各诸侯国在思想上鼓励论争,兼收并蓄,以便从众多的学术理论中寻觅治国、平天下之道,从而促进了战国士阶层的崛起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

战国时代,士阶层日益活跃起来。他们有的聚徒讲学,著书立说;有的游历诸侯,辩其谈说;有的辅佐朝政,参与政事;有的长于权变,纵横捭阖。他们



往往博古通今,经世致用,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突出的政治、军事、外交才能。从总体上看,多数士人以知识、才能、人格、道德活跃于社会舞台,表现了士人的坚定志向、崇高气节和独立自主人格,这就给思想战线上的百家争鸣输入了较强的竞争机制。同时,各国统治者竞相招纳贤士,实行对士阶层的开放政策,为士阶层的崛起和百家争鸣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在百家争鸣中,参与争鸣的诸子几乎遍布各国和各地区。他们评古论今,贯通天人,阐述哲理,经世致用,涉及个体、社会、天人等若干方面,既各陈述己见,自成一说,又互相诘辩,相互吸取,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孟子以学习孔子为志向,以捍卫儒家学说和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新兴地主阶级士阶层的突出代表。他的思想是在与墨家、法家、道家、农家等学派的辩难、论争、吸取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怀着治国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弘扬仁义,宣传德治,同情民苦,抨击暴政,志在济世救民,兼善天下,表现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他在抨击暴政的同时,又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力谏诸侯借鉴三代天下得失的经验教训,摈弃霸道,施行仁政,制民之产,发展经济,减轻刑罚,薄收赋税,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加强修养,改过从善,进而获得民心,统一天下。他以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深邃洞察力和理性批判精神,揭露、批判了当时社会的贫富对立和各种弊端,在深度、广度上,都是前人所未及的。这既在广阔的层面上揭示了当时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又顺应了封建统一的社会发展趋势。

孟子在长期的政治、学术活动中,崇尚仁义,坚守信念,刚直不阿,藐视权贵,强调士人无论在身居穷困之时,还是通达显赫之时,都要坚持仁义节操和不可屈服的独立自主人格,不为富贵所淫,贫贱所移,威武所屈,为坚守道义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所强调的士的志向、节操、尊严,完全压倒了对富贵利禄的追求和满足,既表现了对高尚人格和道德境界的孜孜追求,又表现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坚持理想、不苟全取容的傲岸性格和风骨。

三

《孟子》一书,将个体、国家、天下和天人视为一个紧密相联的整体。从孟子思想的内在联系来看,孟子论述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天的关系,极力追求个体完善、社会协调和天人和谐。孟子思想是由个体论、社会论、天人论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系统整体。

个体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它包括个体的发展、个体的需要、个体的本性、个体的价值等方面。

在孟子那里,个体是指既有饮食、男女的自然属性,又有与犬马不同类的社会属性、道德观念和理性思维活动的人。他将个体的发展划分为幼年、成年、老年三个阶段,认为人的形体构造是一个包括耳、目、鼻、口等感官和理性思维心官的和谐统一的整体,个体的发展受家庭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力行践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个体的需要上,人具有饮食、男女的自然生理需要、人际交往的需要和追求理义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在这些需要中,要以高级需要制约低级需要,以心官制约感官,以天爵制约人爵,不断协调各种需要之间、不同个体之间不同需要的关系,以保持自身需要及人与人之间需要的和谐;在个体的本性和价值上,孟子从人禽之辨立论,认为人具有善的本性。它包括四心、四端、四德三个相联的层次,深化了对人本性的认识;孟子坚持以仁义为核心的个体价值观,认为追求理义精神价值高于生命价值和声色臭味、富贵利禄的物质价值,既主张生存价值、物质价值、交往价值、精神价值的多样性的协调统一,又主张坚持节操、独善其身的内在价值与济世救民、兼善天下的外在价值的统一。

社会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它包括家庭观、国与天下观、社会约制和社会变迁。

在家庭观中,孟子阐述了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夫妇关系,论述了家庭生养繁衍后代的自然生育功能,赡养父母和畜养妻室儿女的经济功能,尊亲敬长的教育功能,以血缘和婚姻情感维系家庭人际关系的情感功能,将家庭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在国与天下观上,主张诸侯要实行仁政,获得民心,



进而实现天下统一,将土地、人民、政事视为国与天下的三个根本要素,强调建立君仁臣义、各尽其道的君臣关系和上行下效、君民同忧同乐的君民关系,提出了“民贵君轻”、得到百姓拥护就能成为天子和“诛一夫纣”的政治卓见;在社会约制上,主张实行下服从上、任贤使能、罢免不肖、惩罚犯罪的政治约制;实行社会分工、产品交换、制民之产、薄取赋税、抚恤百姓等经济约制;以尧舜之道、善良习俗、道德教化等手段促进社会成员自觉居仁由义的思想意识约制;在社会变迁上,考察了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变化,探讨了社会变迁的原因,阐述了社会变迁的方式,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著名命题。

天人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它包括天人的构成要素、天人的和谐及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三个方面。

在天人要素上,孟子认为天包括自然之天、社会发展趋势之天和伦理之天。在自然之天上,孟子用自然之天表示自然万物存在的自然性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在社会趋势之天上,既用天、命表示社会发展的一定必然性,又用它表示社会发展过程中某种时间上的偶然性;在伦理之天命上,认为天是人的善性存在的自然性及其向善发展的必然性;伦理之命,一是指人生命的寿夭长短,二是指仁义礼智对自然欲望、富贵利禄的制约。此外,孟子在引用《诗》、《书》时,还保留了意志之天的含义,仍受到传统天命观的一定影响。在天人和谐上,主张人与天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协调统一,强调人顺从自然规律,就能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从而使五谷、鱼鳖、材木享用不尽;他主张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施行仁政,获得民心,就能达到国治、天下平,主张追求天人协调的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以古代圣贤为楷模,经过深造自得、反省自身、力行践履、艰苦磨炼和正义的经常积累,培养出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攀登上与天地同时运转的圣、神道德理想境界。在天人协调的认识论上,孟子通过对天人范畴的考察,将天作为人的认识、体察、反映的对象,区分了耳目感官与心官的不同职能,认为耳目感官接触外物能获得感性认识,心官能认识自然、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本性而能获得理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感官是心官的基础,心官对感官具有指导、制约作用,感官如不接受心官的制约,就会被外物所蒙蔽。孟子较全面论述了心能知物理、社会发展的必

然性及人本性的重要作用,深化了古代人们对心的认识;在知行关系上,主张由行而知,反对实行了而不知其当然,习惯了而不知道其所以然,终身实行了而不明白其根本道理的倾向,认为知不是被动的,而是能指导、促进行,坚持了知与行的统一。在先秦儒学发展史上,孟子坚持了既重视感性认识,又强调理性思维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

孟子将个体论、社会论、天人论视为一个紧密相联的整体。三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就是说,个体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和谐又是天人和谐的基础;天人和谐促进、影响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又促进、影响个体和谐。总之,孟子思想体系是一个包括多等级、多侧面的有机整体,显示出一定的多样性、有序性和开放性(参见拙文《孟子思想体系新论》,台湾《孔孟学报》第68期)。孟子从整体上探讨了个体、社会、天人的联系、发展和变化,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观和系统观,在中国儒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详见拙著《亚圣智慧——孟子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四

孟子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同时,他的散文创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与早期语录体的《论语》相对比,《孟子》中的若干篇章,从立论、论证到结论,显示出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说理透彻、论证周密和具有整体性构思的特色,是在语录体基础上由章到篇的重大发展。从《孟子》一书的文章风格来看,该书文字一体,笔势一贯,记载了孟子数十年的言论、事迹,综述了几十人的问答,文字流畅,犀利精练,气势磅礴,感情充沛,宽厚宏博,驰骋自如。其中,较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许行章”等,在先秦文学史上是由章到篇的划时代的作品。

《孟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一)刻画众多人物形象

《孟子》一书,描述、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刻画得最为丰满而有立体感的是孟子本人。它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了孟子的性格、气质和特征。



它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崇尚仁义，坚守信念。孟子将仁义视为尧舜之道的根本，既把仁义当做调整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又把它当做个体内在的主体意识和道德精神。他在长期的游历诸国和从事教育的过程中，言必称仁义，强调“志于仁”、“居仁由义”，表现了对仁义的执著追求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孟子一生历经坎坷，不畏挫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仁义当做自己的道德精神支柱。

第二，济世救民，兼善天下。孟子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为实现以仁政统一天下的政治抱负，四处周游，奔走呼号，以承担历史大任自命，立志端正人心，消灭邪说，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唐的言论，继承禹、周公、孔子的事业，认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坚定地相信“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同上）。这些描述使孟子济世救民、兼善天下的形象跃然纸上。

第三，仇视暴政，同情民苦。孟子反对暴政，强调仁政，将商纣视为独夫民贼。他目睹当时劳动人民妻离子散、怨声载道、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苦难，抨击统治者争夺土地、杀人遍野、聚敛财富、骄奢淫佚的暴虐行径，劝告统治者实行仁政，制民之产，省刑薄敛，爱护百姓，解救民苦，表现了他嫉恶如仇、同情民苦的思想情感。

第四，刚直不阿，藐视权贵。孟子认为自己拥有的仁义、节操、尊严高于诸侯的富贵权势，为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苟全取容于诸侯，强调仁义在胸，“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视诸侯的富贵权势如敝屣，尖锐地批评国君的错误，使他们有时惊恐得改变了颜色，有时陷于尴尬“顾左右而言他”，从而表现出刚直不阿、藐视权贵的刚强形象。

第五，不畏艰难，积极进取。《孟子》一书记载孟子游历各国而辗转奔波数千里，历尽艰难和坎坷，仁政主张不为大国诸侯所采纳，受到臧仓的阻挠而不遇鲁平公，还受到淳于髡、尹士等人的诘难和误解，但孟子不因挫折而屈服和退缩。他曾以圣贤经历艰苦磨炼的事迹激励自己，指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认为不论别人是否了解自己，只要尊德

乐义,就能不怨天尤人而悠然自得。孟子晚年退居讲学,以教育为乐,寄希望于后人,从而表现出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

此外,《孟子》一书还描述了孟子对学生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的良师形象,表现了他对权佞之臣的鄙视憎恶之情,等等。读完《孟子》,这位思想家坚守仁义、刚正不阿、藐视权贵、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就会浮现在眼前。

《孟子》一书还描述了一些其他人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譬如通过对话和描写,显示出齐宣王是一个野心勃勃、追求佚乐、志大才疏的庸主;梁襄王是一个精神不振、毫无威严、贪得无厌的国君;陈仲子是一个舍弃人伦、矫揉造作的迂腐人物;臧仓是一个阴险的小人;王骀是一个趋炎附势、谗谄邪佞之徒;象是一个阴谋杀兄霸嫂的虚伪卑劣的恶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二)丰富多采的议论

《孟子》一书不仅描述、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而且有许多结构完整、语言生动、精工严整、意味隽永、感情充沛、气势奔放的论说篇章,呈现浓厚的文学色彩。在这些论说中,有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增强说服力;有时采用生动、形容、贴切的比喻,阐述深刻的哲理;有时运用简洁明快、优美动人、通俗亲切、哲理深隽、词锋犀利、气魄雄健的寓言,以论辩是非和阐明事理;有时善设机巧,使人入彀,驾驭全局,驰骋自如;有时循循善诱,分析利害,因势利导,使人口服心服;有时写法灵活多变,或重复,或对偶,或排比,或层递以贯珠,呈现起伏变化,等等。综合起来看,《孟子》丰富多采的议论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引经据典,增强说理。孟子博学多才,精通《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为了增强语言的文采和立论的说服力,他经常引用古代典籍、孔子等圣贤的言论及成语、谚语。据统计,《孟子》一书引用《诗经》34次,《尚书》20次,孔子等人的言论、成语、谚语及其他传记近30次。孟子在引证《诗经》、《尚书》的过程中,对不少篇章进行了分析评论,提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其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等著名观点,在文学评论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上述引证,有时沿用其本义,有时予以引申和发挥,有时采用正反不同的引文,既增强了文章的文学色彩,又增强了立论的说服力。

第二,善用譬喻,辩论是非。孟子在论说或辩论时善于运用譬喻。其中,



有明喻,有隐喻,有博喻。《孟子》一书,共运用比喻近160个。譬如用“缘木求鱼”说明齐宣王扩张国土、称霸诸侯的愿望不能实现;以雨露滋润禾苗和水向下流说明施行仁政能统一天下;以“菽粟如水火”说明百姓丰衣足食;以“牛山之木尝美”说明人性本善;以“安宅”、“正路”说明仁义;以“挟太山以超北海”说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以“手足”与“腹心”、“犬马”与“国人”、“土芥”与“寇仇”说明君臣之间相对待的关系;以风与草说明君子与小人的道德,等等。孟子运用人类社会中人们常见的事物,巧妙、生动、贴切地说明一些意义抽象难明的问题,既使文章生动和助长了文章气势,又有利于说明事理和辩论是非。

《孟子》除运用比喻说明事理外,还运用了不少生动机智、富有风趣、深刻巧妙的寓言。譬如“五十步笑百步”尖锐地揭穿了梁惠王暴虐百姓而又沽名钓誉的伪善嘴脸;“攘邻之鸡”尖锐地讽刺了戴盈之的横征暴敛、怙恶不悛;“揠苗助长”揭示了违背自然规律就会碰壁;“再作冯妇”抒发了孟子离开齐国的志向;“子濯孺子与庾公之斯”说明结交朋友必须慎重,否则就会遭受祸患;“弈秋诲弈”说明学习必须专心致志;“齐人有一妻一妾”尖锐地讽刺了那些昏夜乞哀而白昼骄人的利禄之徒,蕴含着作者对他们的鄙视、憎恶之情,等等。《孟子》的这些优美动人、通俗亲切的寓言,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第三,善设机巧,诱人入彀。孟子在与人辩论是非时,由于能驾驭全局,所以能提出许多诱导对方接受自己观点的诱问,具有扣人心弦、诱人入彀、以柔克刚、扼喉抚背的修辞效果。譬如《孟子·梁惠王下》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不是采用一本正经的说教,而是紧扣对方的爱好,接连运用两个诱问:“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他接着围绕音乐这一论题,阐述了与民同乐就能统一天下的民本思想,从而取得了神奇的功效。又如《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孟子与陈相关于社会分工的辩论,孟子接连运用了10个诱问,采用步步逼近的手法,迫使陈相承认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从而驳倒了对方。这样,孟子的诱问迫使对方入彀而自陷困境,显示了他高超的论辩技巧。

第四,笔法灵活,起伏变化。《孟子》一书采用灵活的笔法,使文章充满奇



妙的变化。有时将同一语句,反复其词,加强语势;有时采用对偶或排比,口若悬河,不可遏止,刚劲奔腾,文势壮阔;有时文意上下相接,蝉联鱼贯,给人联珠缀玉的美感;有时前后照应,思想连贯,辞义畅达;有时正反对比,说理透辟,意味悠长;有时先疑后决,起伏波澜,引人入胜;有时夹叙夹议,叙事说理融为一体,交相辉映;有时先分后总或先总后分,结笔有力,眉目清楚,井然有序,等等。

总之,《孟子》一书的总体特色是感情充沛,气势奔放。文章中饱含着作者的激越之情,读后令人感到一种火辣辣的味道。他斥责时弊,抨击暴政,既激荡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又言辞犀利,锋芒毕露,呈现凌铄一切之势。当他阐述自己的志向和理想时,又豪爽直率,泼辣热烈,显示了对仁义之道的坚定信仰。当他谴责见利忘义之辈和权佞之徒时,又充满鄙视、憎恶和激愤。《孟子》散文的气势,对后世的贾谊、韩愈等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

孟子这位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生前虽不得志,但仍怀着匡正时弊、济世救民、兼善天下的宏大抱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的历史责任感,百折不挠地追求美好的理想社会,坚信仁义在胸就能进退应付裕如。这就使他能摆脱功利、穷达的困扰而比急功近利的当权者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孟子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贫富对立,批判了统治者祸害百姓的各种暴行,着眼于新兴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过多地看到以仁政治理国家、获得民心、安定天下的有利的一面和兼并战争给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破坏生产的一面,而忽视了战争在客观上促进封建统一的一面;当权者则较多地重视以战争手段获得眼前的功利而忽视行仁政、得民心、王天下的长远利益。因此,在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一问题上,孟子与当权者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所不同的是采取仁政、得民的手段,还是霸道、战争的手段,是注重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还是局限于眼前的功利。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都不可能认识到仁政与战争交互为用的辩证关系,难以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协调起来。在这里,孟子思想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理想性。就孟子思想的现实性来看,它不





仅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否定奴隶制和追求社会进步的要求,而且对巩固、发展新兴封建制度和实现封建统一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与当时广大劳动人民要求休养生息、摆脱战乱痛苦和安定生活的强烈愿望也是一致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及保持社会的稳定;就孟子思想的理想性来看,孟子劝说统治者施行仁政、放弃战争和与民同乐、保民而王,对急功近利的当权者来说毕竟是远水解近渴,不符合统治者聚敛财富、穷奢极欲、扩充国土、称霸诸侯的现实需要,结果被诸侯视为迂阔而不被采用。

孟子生前虽不得志,但在其死后的两千多年间却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的推崇,孟子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由于孟子思想是由多层次、多因素构成的系统整体,所以对后世的影响不是单一的、直线式的,而是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渗透、影响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道德修养、人伦日用、协调家庭、安定社会、化民成俗、治国安邦等多种作用和影响。譬如在政治影响上,从战国时代《孟子》被列为子书,到汉代被立为传记博士,宋代被列入“十三经”,元代被封为“亚圣”,元、明、清时代《孟子》是科举的必考科目和学者的必读之书。康熙帝亲撰碑文颂扬孟子“岳岳亚圣,岩岩泰山,功迈禹稷,德参孔颜”(《御制孟子庙碑》)。乾隆帝书写表彰孟子“道阐尼山”、“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同切禹颜”的联额,并先后两次亲谒孟庙,对孟子塑像拈香行一跪三叩之礼,将封建帝王对孟子的尊崇推向极点。在思想影响上,从汉代的注音释义、考释名物典制和分章断句、串释义理,到宋代的探其微言、阐发义理,再到清代训诂名物的考证和道德义理的阐述,封建时代思想家对《孟子》一书的注疏、释解、辨析、训诂、校勘等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其中,较著名的思想家如陆贾、贾谊、司马迁、赵岐、韩愈、孙奭、朱熹、张栻、程颢、程颐、陆九渊、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阎若璩、戴震、焦循等,都在注孟、评孟、解孟的过程中,继承、发挥、引申了孟子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孟子思想对地主阶级改革派、太平天国领导人、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新儒家、中国共产党人及史学工作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孟子思想还传播海外,对朝鲜、日本、新加坡、越南、泰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孟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具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譬如政